易混淆的法律術語

宋小莊

被告與被告人

在香港，「被告」與「被告人」同義，兩者並無分別，皆指與「原告」或「原告人」對稱、被追究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它既可指民事案件中被提起民事訴訟的人，也可指刑事案件中被指控犯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但在中國大陸，「被告」與「被告人」有不同的使用場合。「被告」只在民事訴訟中出現，「被告人」則在刑事訴訟中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81條規定：「起訴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二)有明確的被告、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00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份，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可見，「被告」一詞在民事訴訟中使用，「被告人」一詞則在刑事訴訟中使用。這種區別在大陸的司法文書中還可以找到證據，此不贅述。

然而，上述區分並不適用於或推論到「原告」或「原告人」。在中國民事訴訟中，「原告」或「原告人」的含意相同。在中國刑事訴訟中，因由公訴人負責起訴，故不稱「原告」或「原告人」，而受害對象則稱為被害人或證人，這是需要說明的。

「義務」的歧義

「義務」是多義詞，通常指：(一)不受酬勞或自願作出的行為；(二)責任。兩者的意義幾乎相反。前者如：義學是指中國曾有過的一種免費私塾；義工是指自願不受酬勞的社會工作者；義務勞動是指不獲得報酬的工作。後者如：義務教育是對一定年齡的兒童所實施的一定範圍內的普遍教育，即強迫教育；義務兵役制是公民依照法律規定在一定年齡內有服一定期限兵役義務的制度。

作為法律術語的「義務」卻只有「責任」義。法律規範可分為授權性和義務性兩類。授權性規範允許或授權人們作出某種行為；義務性規範規定人們應當作出或不應當作出某種行為。義務性規範由法律規定人們應當履行的責任，要求負有義務人作出或禁止作出一定行為，故具有強制力。作為法律術語使用，「義務」含義明確，並無歧義。

Amnesty 與大赦

《香港人權法案》第二條第四項規定：「受死刑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

一切判處死刑之案件均得邀大赦、特赦或減刑。」查大赦的英文原文是 amnesty。在英國法中，amnesty 指由英國王室提出、經國會立法批准的對犯罪的赦免，所以《英漢法律應用詞匯》(香港政府出版)將 amnesty 譯為大赦。但在一般情況下，amnesty 除專指大赦外，亦可指赦免，所以《英漢法律詞典》(法律出版社出版)將 amnesty 譯為大赦、赦免。

香港政府在 1997 年以前是否有實行大赦的意圖，不得而知。縱使有此意圖，也必然有立法上的重大困難。1997 年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否有權通過大赦的法律，亦頗成疑問。儘管將來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仍然保留與香港基本法不抵觸的香港原有法律，但在總體上它應當屬於中國的法律體系，而大赦在中國法律中有特定的含義，不能不加以注意。

上海辭書出版社《法學詞典》「大赦」條云：「由國家元首或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以命令方式赦免特定犯罪或一般犯罪的全部或部分刑罰，包括不提起刑事追究或撤銷已提起的刑事追究以及經赦免後不再存在的前科。」由此看來，作為中國地方行政區域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沒有單獨實施大赦的條件。

當然，目前香港以及日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仍有實施特赦的可能。大赦與特赦的區別在於：

(一)大赦指赦免罪；特赦指赦免特定的人。

(二)大赦可以免除刑罰的執行，也可以免除刑事追究；特赦只能免除刑罰的執行。

(三)大赦可使犯罪者的犯罪行為在法律上完全消滅；特赦只能消滅其刑，而不能消滅其罪。

(四)大赦不公佈被赦人名單；特赦則往往公佈被赦人名單。

香港目前只有總督，日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只有行政長官，以致本港立法局或日後的立法會均不賦予大赦的權力。《香港人權法案》所據的有關國際公約亦指判處死刑後的案件而言，故以適用消滅其刑、而非其罪的特赦方為恰當。《香港人權法案》把 amnesty 譯為大赦，值得商榷；英文版法案中 amnesty 亦有再次斟酌以確定其立法用意之需要。

「功能團體」的英譯與還原

在一般香港市民心目中，功能團體是指：(一)工商業行會組織，如香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等團體；(二)專業性組織，如香港醫學會、香港律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等團體；(三)勞工組織，如工聯會等團體。倘需明確功能團體的確切含義，自然應當翻查香港法第 381 章《立法局(選舉規定)條例》第四條及其附表。

香港基本法中功能團體均譯為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基本法附件二出現功

能團體三次，全國人大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出現功能團體一次，皆是如此。英文的 constituencies 是指選區或選民，因此用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來譯功能團體，譯不出「團體」即 bodies 或 organisations 的意思；但由於香港選舉條例採用了 constituencies，而不用 bodies 或 organisations，所以香港基本法將功能團體譯為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亦無可厚非。

然而本港的翻譯卻又別創一格。港督施政報告英文版第 133 至 137 段出現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十三次，施政報告中文版均譯為功能組別。由於功能團體以團體的存在為前提，而功能組別卻未必要求有組織的設置，功能組別顯然並不同於功能團體，可見功能組別的譯法值得商榷。誠然目前中英關於香港政改的爭論並非翻譯或學術之爭，但由於爭論的其中一個焦點涉及功能團體選舉，與翻譯的用意和取捨恐怕或多或少都拉上點關係。

為求官式文件的用詞一致，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似以譯作功能團體為宜。港督也多次強調其政改方案符合基本法，因此施政報告的有關翻譯沒有理由不採用基本法的措詞，正如基本法對功能團體的英譯採用香港選舉條例的措詞一樣。

根據香港《法定語文條例》，中英文都是法定語文。香港基本法第九條同樣規定，中英文都是正式語文。但偏偏在功能團體問題上對中英文的表述有不同的理解，令人感到遺憾。就香港基本法而言，其中文本由全國人大通過，其英文本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全国人大的常設機關，全國人大才是中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由此推斷，香港基本法中文本的法律效力是最高的。倘若自制定基本法當時的香港現狀及立法背景而論，功能團體不能一經過英譯而成為功能組別。至於可否對功能團體作出新的解釋，從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四款的規定來看，未經徵詢在基本法實施時設立的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可能對基本法作有別於起草和通過基本法當時所理解的解釋。